

## 第十五章 可被學習的芬蘭奇蹟

作者：陳文團\*



---

\* 陳文團，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 壹、前言：芬蘭的教育奇蹟或可被學習的奇蹟

芬蘭的教育改革被全球教育家視為了不起的成就，它徹底改變了芬蘭的教育，使其成為當代最好的教育體系之一（引自Sahlberg, 2009）<sup>1</sup>。西摩拉（H. Simola）一位知名的芬蘭教育家，對所謂的「PISA的芬蘭奇蹟」——全球教育家對芬蘭改革意料外的成功既感到驕傲又懷疑（Simola, 1996）。實際上，西摩拉對於狹義的「神蹟」感到不自在，因此他假設性的視芬蘭的成功為傳統與後傳統傾向之「令人好奇的偶然。」他提及：「使芬蘭教育得到高評價的『芬蘭秘密』，可被視為現代福利國家與其綜合教育脈絡下令人好奇的偶然。」（Simola, 2005）當西摩拉稱芬蘭奇蹟為一種「矛盾」之際，他很正確的意識到此成功的脆弱與不確定性（Simola, 2005），可見其已清楚地意識到奇蹟無法作為未來芬蘭的穩固基礎。

西摩拉點到了芬蘭教育問題的重點：即芬蘭奇蹟不能被了解為宗教意義的奇蹟，即不能做為某種超越人類理解以及無法被理性計算或科學解釋的事件。相對於宗教奇蹟，芬蘭的「奇蹟」可以被理解，甚至可以被學習，並可應用到其他社會，因此，它應該被了解為將芬蘭價值與全球現代價值有效落實與理性建構的邏輯結果。如此完善建構的體系乃長期的批判性學習過程的成果；西摩拉因而同意果斯汀（Harvey Goldstein）的論點，承認在全球文化的挑戰下落實與建構地區價值（作為芬蘭奇蹟）的因素（Simola, 1996）。

在此脈絡下，本文部分認同西摩拉的論點，不將芬蘭教育改革的成功視為嚴格意義的奇蹟；而將芬蘭奇蹟或類似的奇蹟稱為可被學習的奇蹟（Miracle by learning）。「可被學習的奇蹟」表現出的是超出人們的期待卻又在人的能力所及的偉大成就，如此的成就乃是努力、明智選擇目的，以及理性使用方法的邏輯結果。德國的阿德諾（Adenauer）奇蹟、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奇蹟、台灣八〇年代的經濟奇蹟，以及其它地區類似的奇蹟都是如此。在此意義下「奇蹟」僅代表人們對於這些國家在經濟或教育方面的偉大成就的稱讚，而且，如果人們知道如何將不同的因素

<sup>1</sup> J. Routti & P. Ylä-Antilla “...there are few, if any, other examples of natural resource-abundant countries that have managed to transform their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ward higher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value added so rapidly and successfully as Finland”。

組合起來以產生最大效益時，奇蹟也可以被複製。這就是為什麼本文支持「可被學習的奇蹟」之論點——此類的奇蹟是可被學習（並複製）的。德國、日本、台灣以及芬蘭的成功無庸置疑的是它們從過去的錯誤經驗中學習（德國、日本）以及學習其他先進國家優點（台灣、芬蘭）的成果。

於此，如何學習（而非如何相信）乃教育所關注的。科學知識可經由教育獲得，宗教信念則不然；前者可被測試並且必須被證成；相對的，宗教神蹟的信念無法被實驗，因為它本身是無法被學習、複製以及重複的，它代表的是超越人的理解與能力的現象。作者並不否定宗教奇蹟的存在，實際上，就某意義來說，作者相信宗教奇蹟，但並非視芬蘭奇蹟或台灣奇蹟為宗教意義的奇蹟；宗教奇蹟也非本文討論的範圍，甚者，其亦是我們無法學習者。

反之，本文強調的是芬蘭奇蹟。它如同台灣奇蹟般，是可以被學習的；實際上，它們是長時間學習的成果。我們從自己以及他人的經驗中不斷學習。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學習他人的優點、學習全球性的知識與技術，甚至學習如何處理可能產生的問題等（Poper, 1961）——這些都是促使奇蹟可能發生的決定性因素。

## 貳、學習過程

基於以上理由，本文將芬蘭教育改革的成功視為長時間學習如何將芬蘭傳統的優點與現代化以理性的方式重新建構的必然成果。或許在某意義來說，芬蘭奇蹟是「獨特的」：因為它是第一個將此策略運用到教育上並且成功的例子；它也無法被大量製造、複製以及輸出，因為它的歷史文化背景是獨特的。但是如此的獨特性可以被修正，甚至被學習：學習成為獨特的。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是獨特的，因為那是我們自己所犯的錯。從他人身上學習並不代表無意義的複製、不具批判性的仿製或無腦的採納，而知道如何避免重複他們的錯誤，也知道如何將他們的優點融入我們自己的體系。這才是本文所稱「獨特」的意義。知道如何學習他人的優點並且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價值與新的價值結合的國家，才有機會改善自己的教育體系。芬蘭採取的教育原則和策略正源自於「學習

原則」(learning-principle)：學習成為民主的、積極正面的、批判性的、理性的以及具有競爭力等。正因為如此，芬蘭成為我們必須學習的對象之一。

此學習原則在西摩拉以及撒爾伯(P. Sahlberg)對芬蘭成功的評論裡有完整的描述。根據撒爾伯的說法，芬蘭之所以會成功乃因為其採納了以下策略或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提升(國民的)教育水平。芬蘭的教育水平在歐洲是最高的是不爭的事實。99%以上的芬蘭人完成基礎義務教育、95%完成國中、90%完成高中以及將近2/3芬蘭人就讀於大學或科技學院。數字證明一切(Sahlberg, 2009)。

第二個原則是達成教育成果的公平性。策略上，芬蘭廢除綜合教育的能力分組，使所有學生有相同的學習期待並縮短高分與低分的差距。古柏(Grubb)觀察到——以撒爾伯的話語表達——芬蘭教育改革成功地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建立了一個公平的教育制度，這是它在七〇年代所設定的目標。(引自Sahlberg, 2009)

第三個原則是鼓勵學生正面的學習態度。與其它國家相較，芬蘭學生在PISA評量的得分很高。根據OECD成員國家和27個其它國家的報告，芬蘭在數學、科學以及讀寫能力的得分是最高的(緊接在後的是日本與南韓)。

第四個原則是善用金錢並妥善花費在教育上。芬蘭的教育經費並不任意揮霍，而確保花費的金額是合理而且是納稅人所能接受的。合理的花費要求經費必須有效的被運用。事實上，芬蘭花在教育的經費是平均額度，相較於許多先進國家，芬蘭的教育平均經費是相對少的。實際上，荷蘭、丹麥、瑞典、挪威、美國、英國、日本、澳洲以及其它國家花費在教育上的額高均過芬蘭。芬蘭的教育支出大約為其GDP的6%，這是OECD國家的平均支出，另外2%花在研究上(Sahlberg, 2009)。此与其它OECD國家相較，並不算多，但是芬蘭的教育卻得到最好的成績。2007年OECD調查指出，儘管芬蘭花費在教育的金額比其它北歐國家以及日本、澳洲等國家還要少，但其教育水平卻為第一(Sahlberg, 2009)<sup>2</sup>。

<sup>2</sup>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0年與2003年芬蘭的教育評分是最高的，在最近的調查則都是前三名。「芬蘭奇蹟」吸引了全球的關注，並因此有許多國際會議研究芬蘭現象。請見Washington Post, 23.05.2005 與 10.06.2005.

在成績斐然的國家中，僅有南韓的教育經費比芬蘭少，但其成績卻是緊追芬蘭之後，高居第二（OECD, 2007）。

然而上述四項策略原則並非唯一決定芬蘭教育成功的因素。儘管對芬蘭有好的評價，撒爾伯提醒我們：芬蘭教育成功的許多秘密依舊是我們所不知道的（Sahlberg, 2009）。實際上，如同撒爾伯所指出者，全球化競爭、公共政策、文化甚至改變過程等對於芬蘭奇蹟的形成皆扮演關鍵性因素，儘管它們常被忽略，當西摩拉研究芬蘭人的想法、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時，他更明確的將此想法表達出來。他發現芬蘭人的傳統性格是：保守的想法、被動服從的態度、教師的特權等。一般來說，這些性格阻礙進步，但芬蘭卻很有智慧的將它們與現代因素結合起來，並且可被稱為「奇蹟式的」成功了。

如同所聲稱的，本文將芬蘭的成功視為可被學習的奇蹟，而最好的學習就是將不同的、甚至互相衝突的因素理性的結合起來。如此的結合或融合乃依據所謂的「文化適應化原則」（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inculturation）。「文化適應化」不是如同我們進口商品或產品般進口外來文化，而是將不同的生活方式融合一起，轉變為我們自己的方式（Tran, 2006）。此所謂的「融合」（fusion），乃指將正面的因素合併起來，如同我們消化食物的養分般。高達美（H. G. Gadamer）以「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來描述此文化的適應化（Gadamer, 1975）。對高達美而言，世界觀可以以視域作為象徵。高達美（Gadamer, 1975）所謂之「視域」猶如「可從某特定至高點看見所有能見事物的視力範圍」，而「視域的融合」就是視野的擴大以及包含不同視野的過程。換言之，文化適應化是獲得新知識，然後進一步將它綜合、融合為更新的知識。學習與綜合越多的知識，則可獲得更好、更廣泛的智慧。教育的成功與否以學生能否發展學習與善用知識於生活的能力為判準。這是本文所謂的「可被學習的奇蹟」之意。

此類適應化與視欲融合學習是芬蘭所採取的方式。但問題是組合或融合是否為一種理性學習？我們是否能夠將不同的、甚至互相衝突的要素融成一體，並讓它維持健康與成長？這是個必須被回答的嚴肅問題。當西摩拉發現文化的差異性還未充分的被反映出來，以及問題尚未被解

決時，他提到了上述問題，他對一個「依舊納入威權主義、服從與群體心態等因素」的文化能夠刺激並增進改革，進而展現耀眼的成就感到困惑（Simola, 2005）。某意義來說，將彼此矛盾的因素——保守的心態與現代化成功結合的本身就是一項「奇蹟」。但是如果保守主義與進步、威權主義與自由主義、服從與創意等矛盾的因素未被圓滿的解消，則如此的奇蹟也就無法被重複，更不可能被學習。西摩拉在芬蘭所採用的所謂「新威權式教學法」（neo-authoritarian pedagogy）找到了暫時性解答。不同於威權主義，「新威權式教學法」並不仰賴權力鞏固教條主義，而是建立一個合乎時代的教學法，以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意即，如果我們可以從它們身上吸取正面因素，則保守主義與威權主義依舊可以產生效益。西摩拉正是在此意義上使用「有意義的因素」（meaningful element）——來描述某些特定因素的正面能量，包括從某些角度可能被我們視為過時的或反動的因素。威權主義、服從性與集體心態的有意義因素實際上可能是能夠增進現代化過程的正面能量。如何吸取以及應用此正面能量使它能够發揮效用，應該是我們主要關心的議題。

## 參、可被學習的奇蹟與理性重建

西摩拉自己本身已意識到此類重建式學習。但是此類的學習必須先從發覺和辨識出如，阻礙等反動能量開始，進而找出解答。用波普爾（K. Popper）的語言來說，學習的過程是個「嘗試錯誤」與「推測與反駁」的過程。於此，西摩拉很快的承認「芬蘭奇蹟」幾乎無法被視為嚴格意義的奇蹟：不論如何，芬蘭的「PISA奇蹟」不再看起來是奇蹟（Simola, 2005）因為「嘗試錯誤」是科學與教育成長的條件；處理問題就是尋找解決傳統價值與當代價值矛盾的方法。芬蘭採取的解決方式並非（馬克思意義的）全面性大變革，也並非（達爾文意義的）進化，而是一種高達美意義的融合。這可從芬蘭所選擇的策略看得出來：其改革的策略是，在邁向現代化的同時又不拋棄傳統價值——沒有任何一個芬蘭傳統價值被犧牲掉。芬蘭教育家試著經由吸取傳統價值的正面能量——依然產生效果的有價值因素——並對傳統進行保存，使得原本看似阻礙的

因素反而成為（改革的）正面能量。原本可能會阻礙現代化的保守的心態、威權主義、芬蘭人顯而易見的被動服從性、教師享有的社會地位、教師階級將自己視為上層社會、相對的工作滿足感以及教學的保守主義等因素（Simola, 2005），被重新建構，使它們能與現代價值融合，因而對改革產生積極的貢獻。

於此我們可以了解，芬蘭在不拋棄傳統價值的前提下，成功的建構當代教育體系是芬蘭教育改革的核心。對大多數人而言，採取自由政策的意思是必須放棄傳統的生活方式，但我們從其它國家的經驗觀察到，芬蘭的立場導致會更多的問題。例如，威權主義的問題不能夠被解放（emancipation）或被自由主義的思想取代；相對的，毫無批判性的採納自由主義，在許多古老國家只會產生更多問題。任何改革之後的動亂都是此等案例。如此，唯有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 Blair）曾經所提倡的第三個方式是可行的，即將傳統價值融入現代價值。意即，改革的重點在於如何將傳統價值的正面能量吸取出來並融入現代化。芬蘭瞭解到看似矛盾的傳統主義與現代化不會阻礙成功的觀點和作法是對的。傳統價值與現代科技思想的結合大大地促成「奇蹟」的發生，這使得西摩拉產生將芬蘭傳統價值與現代化結合的想法。但這並不表示此等融合毫無風險。西摩拉觀察到芬蘭教育改革的策略如同兩面刃：可能有利也有弊。

欲了解芬蘭的成功，必須更仔細觀察芬蘭的教育體系。從某角度來看，改革看似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奇蹟的是只有正面產生影響，負面則是微弱到沒有反應。或許我們會好奇，如果只有硬幣負面的那一面運作的話又會如何？此想法使得西摩拉在處理改革的問題時更為謹慎。較為理想的改革，如以上所指出的，必須處理保守的能量如何與現代能量和平共處（Simola, 2005）。易言之，必須重新檢驗所謂的「新威權式教學法」——一個建立在威權主義價值之奇特的現代教學法。

西摩拉將「新威權式教學法」視為如芬蘭般的國家的獨特產物，且對於它奇蹟般的成功感到好奇。作者並不會將「新威權式教學法」視為芬蘭獨特的產物，因為個人在新加坡、南韓以及台灣等國家觀察到相似的心態以及相似的現代化過程。亞洲四小龍（或老虎）的「經濟奇蹟」不再是神祕的和獨特的。有趣的是，這些國家當時都被威權政權統治，

並且相信服從、忠誠等德性，它們也相信學者階級的權威。但它們不但實現了經濟「奇蹟」，也實現了教育奇蹟。

韋伯（M. Weber）研究過此現象。在他經常被引用的《基督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他將資本主義的誕生解釋為不同因素與信念結合的結果。易言之，資本主義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由眾多如相信人間天堂、節儉、服從、努力等因素所引起的。在此，韋伯提出了保守價值觀與現代方法理性結合的假設（Parsons, 1930）。韋伯的理論被許多中國、日本以及韓國學者用來解釋遠東國家如日本以及台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等的崛起。這些儒家傳統的國家能夠學習西方理性主義，並將它與自己本身的傳統價值結合，創造出深受期待的經濟奇蹟。

## 肆、結論

教育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無法抽離生活世界、文化與歷史等出來，故並不遵循直線，而是依據人類生活的方式發展。教育是為了有效因應當今與未來的問題而將不同的生活方式、視野、論點與價值觀等結合與融合的科學。教育的目的是學習如何將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結合和融合以產生更高的價值。芬蘭的PISA奇蹟在此脈絡下可以被了解，台灣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也應該在此意義下考慮採取芬蘭的方式，此並非盲目的複製或無批判性的採納，而是理性選擇；而理性選擇是普遍的，並非芬蘭的獨特產物。

## 伍、參考文獻

- Sahlberg, P. (2009). *A short history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Finl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imola, H. (2005). The Finnish miracle of PISA: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remarks o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41 (4), 455-470 °
- Popper, K.(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OECD (2007). *PISA 2006: Science competencies for tomorrow's world, Vol.1*. Paris: Author.
- Tran, Van Doan (2006). *Towards a pluralistic culture: Essay on cultures in the postmodern era*. Washington, DC: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 Gadamer, H. G. (1975). *Truth and method* (G. Barden & J. Cumming, Trans.). NY: Seabur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0)
- 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 Parson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5)